

中 | 华 | 经 | 典 | 名 | 著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说文解字

汤可敬 译注

【一】



中華書局
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中华
经典
名著

汤可敬◎译注

说文解字 一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说文解字/汤可敬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8.6(2018.11重印)
(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)

ISBN 978-7-101-12960-1

I.说… II.汤… III.《说文》 IV.H1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99875 号

-
- 书 名 说文解字(全五册)
译 注 者 汤可敬
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责任编辑 舒 琴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115 $\frac{7}{8}$ 字数 2000 千字
印 数 8001-16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2960-1
定 价 258.00 元
-

前言

清代学者王鸣盛在《说文解字正义序》中说：“《说文》为天下第一种书。读遍天下书，不读《说文》，犹不读也。但能通《说文》，余书皆未读，不可谓非通儒也。”推崇《说文解字》未免太过。但是，如果换一个角度，也许并不过分。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，是社会交际的工具，是人类文明的载体，《说文解字》是汉民族第一部分分析字形、说解字义、辨识声读的字典，是不朽的词汇著作，是东汉以前的百科全书，说它是“天下第一种书”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

一 许慎和《说文解字》的写作

许慎，字叔重，东汉汝南召陵（今属河南漯河）人。尝从贾逵受古学，博通经籍。《说文解字》创稿于和帝永元十二年（100），直到安帝建光元年（121）九月，始遣其子许冲进上。《说文解字》的产生，不是偶然的，是东汉的客观条件与许慎的主观条件碰撞的结果。

第一，周秦两汉的文字、词汇研究，为《说文解字》的出现奠定了学术基础。西周有《史籀篇》，秦朝有《仓颉篇》《爰历篇》《博学篇》，西汉有《凡将篇》《急就篇》《元尚篇》《训纂篇》，东汉有《滂熹篇》；还有成书于汉初的《尔雅》，成书于西汉末年的《方

言》；还有从地下或墙壁里挖掘出来的古本，从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铭文：诸如此类，都为《说文解字》的成书准备了成千上万的各种体式的单字。周秦两汉《史籀篇》之类的识字课本和《尔雅》《方言》诸书，为《说文解字》的编排提供了借鉴。许慎以前的经学家和小学家关于汉字形、音、义诸方面的研究成果，如“六书”说，就为《说文解字》提供了理论指导。

第二，汉代今文、古文学派的激烈斗争，为《说文解字》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。今文是指隶书，古文是指先秦六国古文。经典因记载的文字不同而分为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，这本来只是字体的不同，但研究者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。今文经学派认为经书是圣人之言，字字句句寓有“微言大义”，大可经世致用，常常断章取义，任意引申比附。古文经学派认为应该根据字义客观地解释经义，应该重视语言文字之学，树立它在经学上的崇高地位。许慎是古文经学家，他生活在东汉中叶之后。此时，正值今文经学派逐渐衰落，古文经学派逐渐兴盛。他不能容忍为要经世致用而曲解文字的现象，猛烈抨击那些“玩其所习，蔽所希闻”的俗儒，那些“竞逐说字解经，喧称秦之隶书，为仓颉时书”的鄙夫。他认为文字是“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”，曲解文字必然篡改“经艺”，不利于“王政”。为了驳斥今文经学家篡改经义的说法，许慎立志写作《说文解字》。

第三，许慎渊博的学识和求是的精神使他这种志向变为现实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·许慎传》说：“少博学经籍，马融常推敬之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‘《五经》无双许叔重。’”可见其学识当为同辈人之出类拔萃者。《许慎传》又说：“性淳笃。”淳，纯实；笃，忠厚。就是说许慎一辈子忠厚老实，实事求是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能上下求索，博采通人，力求做到小大立论，信而有证。“其于所不知，盖阙如

也。”（见《说文解字叙》）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，让它缺着，不自以为是，强作解人。

许慎把庞杂的汉字分为依类象形的“文”和形声相益的“字”，倾注毕生的精力，撰写了《说文解字》。

二 《说文解字》的历史地位

1. 理论的贡献

《说文解字叙》是汉字学的纲领。它系统地阐明了汉字的产生、发展、功用、结构方面的问题。汉字的产生跟一切文字的产生一样，是社会交际的需要。八卦虽是法定的图象，但不能记录纷繁的事物；结绳虽能留下记忆的线索，但绝不能适应“庶业其（极）繁，饰伪萌生”（见《说文解字叙》）的社会发展的需要；只有能够互相区别纹理的汉字，才能察“万品”，治“百官”。汉字不论是体式还是内部结构，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。许慎辛辣地批驳和嘲笑了汉字凝固不变的观点。《说文解字叙》就是一部东汉以前的汉字发展史。除体式发展之外，还论及汉字内部结构的发展。“盖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。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文者，物象之本；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。”许慎认为，文是源，字是流。汉字是沿着由简单到复杂、由文到字的孳乳浸多的方向发展的。“箸于竹帛谓之书，书者如也。”将文字连贯起来写明在竹帛上叫作书，书就是如描写对象之状况。联系到《说文解字》正文大量引用书证，让词进入语句中确定意义，就知道许慎是把文看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的。“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。”说明文字是超时空、超阶级的工具，是人类文明的载体。文字虽然没有阶级性，但在有阶级的社会里，却是统治者维

护统治的最重要工具之一。“文者，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，君子所以施禄及下，居德则忌也。”“盖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。”（以上均见《说文解字叙》）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。

“六书”说本来是战国末年以来流行的文字学理论，见于《周礼·地官·保氏》。直到西汉末年才有六书细目的记载，见于刘歆的《七略》，班固曾转引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。后来，郑众给《周礼》“六书”也作了一个注。班、郑各有名称和次第，但没有阐明六书的内容，更没有具体分析繁多的汉字。许慎第一次对六书作了界说，并且在逐字说解中将六书原则贯彻始终，牢固地建立了汉字结构理论体系。

先看看六书分类的标准：在《说文解字叙》中，他指出“指事者，视而可识，察而见意”，这是从认字识字的过程说的。“象形者，画成其物，随体诘屈”，这是从画物显象的角度说的。“会意者，比类合谊，以见指撝”，这是从组合部件汇合意义的角度说的。“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”，这是从字符与字的关系，即形符、声符与形声字的关系的角度说的。“转注者，建类一首，同意相受”，这是一类特殊的形声字。“假借者，本无其字，依声托事”，这是从把意义寄托在音同或音近字的角度说的，但就不增加新的形体来说，假借是一种用字的方法；就表达与本义毫不相关的意义、传递新的信息来说，未尝不可以说是造字的方法。整体说来，作为造字的方法，六书的基本层次是清楚的。

指事 象形 会意 形声 转注 假借

1 _____

2 _____

3 _____

第一个层次是用是否借同音字表义为标准，第二个层次是以有表音成分为标准，第三个层次是以独体显象还是合体会意为标准。真正有些模糊的，就是部分指事字和象形字的界限。这是由于它们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分类标准。

自许慎以后，近两千年来，不断有人对“六书”理论提出批评、修正、补充。就以今人来说，唐兰在《古文字学导论》《中国文字学》里提出了“象形”“象意”“形声”三书说，陈梦家在《殷虚卜辞综述》里提出“象形”“形声”“假借”三书说，裘锡圭在《文字学概要》里提出了“表意”“形声”“假借”三书说，他们在各自的研究中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不同程度地丰富了汉字的构形理论。但许氏“六书”说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，上述诸说谁也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它。于省吾通过甲骨文研究，发现了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和附划因声指事字（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：见于省吾《甲骨文字释林·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》。附划因声指事字：见于省吾《甲骨文字释林·附录：释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》）。照他的说法，前者补充了象形字向形声字发展的一个过渡环节。其实就他的八个例证看来，所谓表音的部分，依然是被记录事物的特征部分，人们依然可以把这类字看成一般的象形字。后者不过是在义异、形同、音近字上加了一个区别的记号，也依然可看作一般的指事字。科学的进步离不开愈来愈精细的分析，于先生上述两类字的发现是极精极细的分析的结果，如果地下发掘的文物上的例证愈来愈多，也许会愈来愈显示其论证的光辉，但即使是到了那时，于先生还是没有脱离许氏六书说的理论系统。

2. 编排的独创

《说文解字叙》说：“此十四篇，五百四十部也。”部，就是部

首，是字形结构部类之首。按照六书的原则，分析字形结构，把在结构上具有相同部分的字排列在同一部类，用这相同部分作为统率这一部类所有字的标目，这个标目就叫部首。《说文解字》中常有“凡某之属皆从某”的述语，它的意思是，大凡某的部属都随从某聚集在一块。这个某，就是部首。将一万多个看起来毫无头绪的汉字，以形为标准，分为 540 部，这是许慎的独创。

周代的字书，汉代还保存着的是太史籀所写的十五篇，它的体例大约与秦代合编的《仓颉篇》相同。秦代由《仓颉》《爰历》《博学》合编的《仓颉篇》，每章十五句，每句四个字。《训纂》《滂熹》与《仓颉篇》相同。《凡将篇》每句七个字，《急就篇》与它相同。这些字书的体例都是杂乱地采取需要的实用的字，按照文理编成有韵的句子，与后代《千字文》一类的捷径杂字没有什么不同。史游的《急就篇》也自称“分别部居”，它的分别是：姓名是一部，衣服是一部，饮食是一部，器用是一部。自然比不上《说文解字》根据形体分门别类加以集中的办法。

段玉裁评价许慎的部首制说：“凡字必有所属之首，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，此前古未有之书，许君之所独创。若网在纲，如裘挈领，讨原以纳流，执要以说详，与《史籀篇》《仓颉篇》《凡将篇》杂乱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。”（见《说文解字注》）

部首制既属首创，当然难免有不完善不精当的地方，比如：无“群”部首，叠文会意字部首，声旁部首，异体字部首，古今字部首，等等。另外，许氏以小篆为解说的对象，“就形以说音、义”，实际上是据义归部，是造字法部首；与后来以楷书为对象，据形归部的检字法部首的要求相距较远，历代文字学家遂对许氏部首有或多或少的改并。南朝顾野王《玉篇》定为 542 部，辽行均《龙龕手鏡》

定为 242 部，明梅膺祚《字汇》定为 214 部，《新华字典》1966 年版定为 189 部，《辞海》1979 年版定为 250 部，《汉语大字典》和《汉语大词典》定为 200 部。但是不管人们怎么改并，不管有多大进展，在漫长的 1900 年间，许氏的部首制，作为一种检字的系统，谁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，甚至可以断言，它将始终与汉字同在。

关于部次，许慎的原则大体是“始一终亥”“据形系联”。所谓“始一终亥”，就是根据汉阴阳五行家“万物生于一，毕终于亥”的说法，以“一”部开始，以“亥”部结束来排列部首。所谓“据形系联”，就是把形体相近的部首排列在一起。试以《说文解字》第八篇前六部（本书卷十五）排列为例（括号里的字是段玉裁的说明）：

亼（人，不蒙上）

乚（匕，倒亼而次之）

𠂔（匕，反亼而次之）

𠂔（从，并亼而次之）

𠂔（比，反𠂔而次之）

𠂔（北，二亼相背而次之）

“不蒙上”，就是不承继上面的形体，由“人”部单立“户头”。把“人”形倒过来，就是“变化”的“匕”。把人形反过来，成了“匕匙”的“匕”。两人相随，成了“听从”的“从”。把“从”字反过来，成了“排比”的“比”。两个“人”字背靠背，成了乖背的“北”。这些部首次第的排列，全都根据“人”形的变化连类而及。这就是“据形系联”。《说文解字》第八篇共 36 部，大都如此。只有“衣”“裘”“毛”“毳”等部，与“人”形无直接关系。《说文解字》部首也有以意义相近为序的。如第十四篇的“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、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

戊、亥”，因为都是干支字，所在排列在一起。

关于各部字的字次，大体上是按字义类别编排。或先实后虚，或先美后恶。本朝皇上的名讳必紧跟部首之后，以示尊崇。部首字的叠文及与部首字相反的形体，排在该部部末。

3. 资料的宝库

《说文解字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东汉以前汉字的形、音、义材料，与之相关的词汇材料，以及东汉以前的百科知识，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
第一，《说文解字》尽量搜集了东汉时能够见到的篆文、古文、籀文、或体、俗体、奇字、今文，保存了东汉以前的字体。解说了单字 10516 个，几乎汇集了东汉以前所有的单字。这是一部无比珍贵的文献。没有《说文解字》，我们很难认识秦朝的篆文，更不用说辨认和研究商朝的甲骨文、周朝的金文和战国时期的古文了。不认识古文字，上古史的研究也就一筹莫展了。

第二，《说文解字》是东汉以前汉字本形、本义的总汇。它是正确训释东汉以前的经、史、子、集的有力工具。分析多义字词，无非是要分析其本义、引申义、比喻义、假借义，而确定本义是确定诸多义项的基础。什么是字的本义呢？与字形结构相吻合的意义就是本义。要寻求本义，就必须分析字形。而《说文解字》就是以分析字形确定本义为己任的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说：“以字形为书，俾学者因形以考音与义，实始于许，功莫大焉。”又说：“依形以说音、义，而制字之本义，昭然可知；本义既明，则用此字之声，而不用此字之义者，乃可定为假借。本义明，而假借亦无不明矣。”至今，训释古籍，编辑字典词典，关于本字本义，大多以《说文解字》为本。

第三,《说文解字》通过形声系统,通过读若,以及假借、声训、重文、联绵词等等,提供大量的上古语音资料。清代诸《说文》学家,凭借它并参照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用韵,研究秦汉语音系统,取得了不少成果。段玉裁《六书音均表》、江沅《说文解字音韵表》、张惠言《说文谐声谱》、陈立《说文谐声孳生述》、江有诰《谐声表》、姚文田《说文声谱》、严可均《说文声类》、苗夔《说文声读表》,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正如姚孝遂在《许慎与〈说文解字〉》一书中所说:“很难设想,如果没有《说文》,我们今天能够对古音有如此深刻的了解。”

第四,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。书面上的一个字,往往表示口头上的一个词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字和词具有同一性。《说文解字》既然保存了东汉以前大量的汉字形、音、义的资料,也就相当程度地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面貌。王力先生在《中国语言学史》中说:“《说文解字》是上古汉语词汇的宝库。”

第五,《说文解字》还为我们研究东汉以前的古代社会,提供了思想情况、政治情况、经济情况、文化情况、科学情况和民情风俗方面的宝贵资料。从这个角度说,《说文解字》是东汉以前的百科全书。

4. 规范汉字的工具

汉文字学史上,只有《说文解字》能“全面地、系统地整理文字,长远地对文字的统一和规范产生广泛影响”(见姚孝遂《许慎与〈说文解字〉》)。一方面,社会愈发展,事物愈繁复,为了区别,文字也就愈来愈多;另一方面,为了更好地交际,不能让文字毫无节制地增加,必须整理,使之规范和统一。规范和统一文字,进行行政干预,如商鞅、秦始皇,也许能起一时的作用,但不可能有长期的效用。而具有科学性、权威性的《说文解字》,则可谓规范统一

文字的有力工具。姚孝遂说：“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全面地分析了文字的形体结构，说明了每个字为什么必须这么写；它应当代表什么概念，而且为什么代表这个概念；它是如何与语言结合起来的等等。《说文解字》特别强调文字的本形、本音、本义，这对于当时盛行的任意同音通假现象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。事实上，《说文解字》广泛流传以后，战国以来，直至秦汉的文字形体混杂，以及胡通乱转的现象就逐渐得到了克服和纠正。”（见《许慎与〈说文解字〉》）

5. 时代的局限

今本《说文解字》在释义、析形、收字、分部、检字诸方面，亦有明显的不足。比如：

王（王） 天下所归往也。董仲舒曰：“古之造文者，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。三者，天、地、人也，而参通之者王也。”孔子曰：“一贯三为王。”

一（一） 惟初太始，道立于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。

五（五） 五行也。从二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。

上三例释义、析形均有误。王，象斧钺之形，是权力的象征；一，用一横线表示数目；五，指事字，象交午形，借为数字五。《说文解字》还有一些字，或释义误，或析形误，例子从略。

《说文解字》收字并不完备。如《诗经·小雅·采菽》篇里的“菽”字就没收。宋代徐铉将经籍常见的而许氏未收的字编入“新附字”，共得402字。

如前所述，《说文解字》分部并不十分完善。一，分部繁杂；二，有些部次说不清道理；三，不少字次无规律可循。连徐铉也不得不慨叹道：“偏旁奥秘，不可意知，寻求一字，往往终卷。”（见《说文韵谱序》）

《说文解字》的上述不足是时代的局限。许慎生活在东汉中叶之后，他的思想难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。当时，儒学定于一尊，谶纬之学盛行，阴阳五行学说泛滥。许氏撰《说文解字》，兼收并蓄，有闻必录。“王”字的解说是儒家的“王权神授”、“天人感应”思想的反映，“一”字的解说是道家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观点的反映，“五”字的说解是阴阳五行学说的反映。

尽管许慎《说文解字叙》说过“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”，但当时出土的古文字毕竟有限，从《说文解字》无一字明确提到出自钟鼎来看，许慎能亲眼见到的钟鼎文字也许寥寥无几。此时甲骨文还远没有被发现。许慎熟悉的小篆、古文、籀文等等都不是最古的文字，其中一些早已失去原形原义。凭失去原形原义的文字来说解，自然不免发生错误。

此外，今本《说文解字》是宋徐铉、徐锴兄弟二人的校定本，许氏原本已找不着了。清莫友芝在同治初年得到宋米友仁审定的唐写本《说文解字》木部的一半，存 188 字。写了《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》一卷，证明与许书原本有些不同。据《说文解字叙》说，《说文解字》正篆 9353 字，重文 1163 字，解说总字数为 133441 字。据清人胡秉虔统计，今天通行的大徐本，正文有 9431 字，重文 1279 字，说解 122699 字。这都说明《说文解字》在流传中，已与许慎原本有一定的差距。今本《说文解字》的不足，又不免夹杂着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讹误。

三 说解的特点

《说文解字》释字，常常是先释义，次析形，次譬音，末征引。

每个字头底下，都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所说，“合三者（形、音、义）以完一篆”。最后，征引各种材料，来证明字义、字形、字音的可靠性。先看下表：

例字	释义	析 形		譬音	征 引
		主解	补充		
飛	(飛)鸟翥也。	象形。			
非	(非)违也。	从飛下翅。	取其相背。		
𠂇	(𠂇)疾飞也。	从飛而羽不见。			
氓	(氓)民也。	从民，亡声。		读若盲。	
𠂇	(𠂇)缺也。	从刀，占声。			《诗》曰：“白圭之𠂇。”

《说文解字》始终坚持“据形释义”的原则。

飛（飞），鸟儿飞举。小篆“飛”象鸟儿向上高飞、舒展脖子、伸展双翅的形状。

非，义为违背。字形是由“飛”下的两个翅膀表示，解释到此，意犹未尽，于是再补充说明“取其相背”，即采取两个翅膀相互背离的形象来说明违背之义。

𠂇，义为飞得极快。鸟儿一闪而过，连身上的毛羽都看不清，当然是疾飞。小篆的字形是“飛”字省去双翅和头羽之形的结果。

氓，义为从别处投奔来的“民”，所以从“民”。

由此可见，《说文解字》字形分析是字义说解的依据，字义说解是字形分析的结果，释义和析形真可谓密合无间。

《说文解字》也十分重视“义传于音”的现象。音和义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，由于联想的作用，人们往往用相同或相似的声音来表示相同或相似的意义，这就出现音、义相依的现象，这种现象必然

反映到汉字的构形中来。《说文解字》声旁部首字、亦声字是许慎重视“音、义相依”现象的最有力的说明。如句部收句、拘、筍、鉤（钩）四字。句是弯曲的意思。拘是曲手而拘止，筍是曲竹捕鱼器，鉤是弯曲的金属钩。由此推广开来，雉是野鸡曲颈而鸣，病是脊背弯曲，劬是曲背劳苦，刈是弯曲的镰刀。由此可见，许慎时代古侯切或九遇切这类音有时表示弯曲义。同声旁字，有意义相通的现象；异声旁字以及其他异形字，如果音同音近，也可能有意义相通的现象。陆宗达《说文解字通论》曾举璫、轅、爰、援、引等为例，说明许慎非常重视音、义的关系。

段玉裁说：“一字必兼三者，三者必互相求；万字皆兼三者，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。”这是许慎解说汉字形、音、义所遵循的原则。下面分述释义、析形、标音、征引的各自特点。

1. 释义的体例

一、一字多义的解释。《说文解字》一般只收一个意义，有时也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，常用的述语是“一曰”；也有不用“一曰”而需读者仔细推敲的，即人们常说的“一句数读”的现象；还有将另外的意义寄托在书证之中的现象。例如：

詒（诒） 相欺詒也。一曰，遗也。

次 不前、不精也。

虚 大丘也。昆仑丘谓之昆仑虚。古者九夫为井，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。丘谓之虚。

姘 除也。汉律：齐人予妻婢奸曰姘。

𤝵 顿仆也……《春秋传》曰：“与犬，犬𤝵。”

“次”条，是一句数读例。即：“不前也；不精也。”有不在前面和不很精粹两个义项。“虚”以下三例是别义寄于书证例。“虚”

的本义是大丘；别义是人们聚居之地，即井邑之类。又别义寄托在“古者”四句书证中，书证引自《周官·小司徒》。“𡗗”的本义是除掉；别义是与妻子的奴婢通奸。“𡗗”的本义是像叩头一般向前倒仆；别义是倒地而死。除“詒（诒）”的欺诒义和以言语相赠遗义之间看不出明显的意义联系之外，此类例证的多义现象，此义与彼义之间，大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二、连篆为句。《说文解字》每条说解之前的小篆是训释的对象，是字头。它与说解，不论在意念上还是在语法上不存在判断关系。比如：

琅（琅）玕，似珠者。

小篆“琅”是作为字头出现的，“琅玕”是作者在“琅”条下搜集的“琅”与“玕”组成的联绵词，这个联绵词表示像蚌珠一样的美石。“似珠者”是训释琅玕的，而不是训释琅的，不能理解为“琅是琅玕”或“琅是似珠者”的意思。而应理解为：“琅，琅玕，像蚌珠似的美石。”有时候，为了简洁，作者省去字头底下联绵词或叠音词的第一个音节，或者省去反义复合词的第一个词素，或者省去同义复合词组的第一个词。省略的条件是，这第一个字是篆文字头的重复。我们理解时，应该“连篆为句”，也就是说，应该补充这被省略的与篆文重复的字。比如：

離（离）黄，仓庚也。

傖 傖，左右两视。

昧 爽，旦明也。

参（参）商，星也。

險（险）阻，难也。

峻 峭，高也。